

当代我国大都市的社会空间分异

——对上海三个社区的实证研究

李志刚 吴缚龙 卢汉龙

【摘要】全球化下西方后福特主义城市转型的主要特征是社会空间极化。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空间的重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空间转型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社会空间异质性的增加。这一新变化反映了全球化下城市转型的普遍规律。本文以上海为考察对象,选取三个典型社区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上海社会空间分异在微观空间层次上的现状和特征,对其主要机制进行了分析。我们的研究表明,社区建设的历史时段对其社会空间构成具有重要影响;社区内部的均质化与社区之间的异质化两种趋向正同时发生;市场因素正逐步成为影响社会空间重构的主要因子。由此,本文强调分异中的社会空间形态对城市规划的新要求,市场转型迫切需要规划师拓展视野,关注空间资源配置的公平合理。

【关键词】社会空间分异;上海;社区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REE NEIGHBOURHOODS IN SHANGHAI

LI Zhigang; WU Fulong; LU Hanlong

ABSTRACT: Post-fordist cit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socio-spatial polarization. In urban China, increasing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echoes the process. It presents the general dynamics of urban transition under globalization. With reference to Shanghai,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three neighborhoods to show the process, features and dynamics on small areas concerning differentiation in urban China. The co-existence of inter-neighborhood homogenization and intra-neighborhood heterogenization shows the increasing impacts of market factor vis-à-vis institutional factor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t suggests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wards an equal distribu-

tion of socio-spatial resources in urban planning.

KEYWORDS: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Shanghai; neighborhood

1 社会空间分异是当代城市转型的普遍特征

1970年代以前,基于高效的泰勒式管理和福特制生产模式,西方尤其是北美经济水平飙升,中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体出现(Knox and Pinch, 2000)。同时,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这些国家对贫困失业家庭提供福利资助和公房,保证了社会的相对公平。但是,近20年来,经济全球化下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Harvey, 1991)促成了全球生产活动的分散化重组,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产业转型。萨森(Sassen, 1991)的研究表明了全球化对大城市尤其是所谓“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纽约、伦敦、东京的巨大影响:一方面是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精英在这些城市集聚,金融、贸易等产业得以大规模发展;一方面是随之出现的为这些精英提供各类服务的产业,日益增加的国际移民成为低技术、低工资服务业的劳动力。非生产型的保险、金融和不动产业以及创新型产业如广告媒体、音乐制造等成为新的经济主体,国际性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而制造业大幅紧缩。在她看来,这种职业结构转型造成了新的社会极化:处于经济收入水平两端的人群出现膨胀而中等收入的人群减少,构成所谓“沙漏型”的社会结构。作为空间结果,城市变得更加“分化”、“碎化”和“双城化”(Fainstein, et al., 1992):一极是精英阶层在舒适豪华的典雅社区居住,这些社区通过围墙、保安等杜绝外人的自由接触,形成所谓“防卫型社区”(gated community);另一极是城市下层、低收入人群或有

色种族在衰败的城市中心区密集居住,其边缘化地位甚至导致了一个“下层阶级”(underclass)的出现(Wilson,1987)。当代西方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主要趋向是不断增加的社会空间极化(Mollenkopf and Castells,1991;Fainstein, et al.,1992)城市因此也被称为“双城”、“碎城”、“多极城市”等。这一新城市现象的影响深远,马库斯和范·凯普甚至怀疑新的城市空间极化是否预示了一种新型城市空间的全面出现。尽管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否定的。他们的研究表明社会空间极化的趋势无一例外地出现在各类城市中:加尔哥达、新加坡、东京、纽约、布鲁塞尔、悉尼等等(Marcuse and Van Kempen,2000)。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也将其置于全球化和市场转型的特殊背景之下。随着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生,各种分异现象正在中国的城市中出现,例如跨国公司职员和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收入、住房上极化地位的凸现(Gu and Shen,2003),高级地产项目、郊区别墅区的出现(Hu and Kaplan,2001),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外来人口聚居地的出现(Gu, et al.,1999),以及新城市贫困现象在城市某些地域的显现等等,社会空间的分化似乎已经成为今天城市居民的日常体验。

2 历史与现实

空间分异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且为传统礼教所提倡。总体上,封建时代我国城市社会以“官”和“民”划分,王公贵族的住区多接近宫城,与平民住房分区。大城市社会空间依照礼制《周礼》布局,以宫殿为中心,生产活动多和居住相结合,且居住空间一度被人为分割。

近代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出现了尖锐的社会极化。大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大连、青岛、上海、广州等被割裂为“外国”和“本土”两部分(Logan,2001)。在上海,社会空间的分异形成了所谓“上只角”和“下只角”,“上只角”为外国人或外侨的高级住宅,而“下只角”居住的多是乡村农民和难民(Lu,1999)。同时,近代工业、交通等的发展使生产和居住场所在空间上发生了分离。总体上,城市社会空间依据其形成背景的不同,大体可划分为老城区、租界区、自发形成的工业居住混合区和有一定规划的新市区四大区块(庄林德、张京祥,2002)。

新中国的建立使城市空间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建设重视住房分配的公平和居住空间的控制。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居

住区的规划建设采取最小化通勤距离的策略,将工作单位和居住空间揉合成一体。单位制的建立使不同身份地位人群混居的异质型社区成为空间的主体。在这一条件下,城市社会空间的特征表现为单位大院之间的分异,居住空间的质量取决于单位在计划资源分配链上的地位(Logan, et al.,1999)。总体上,这一阶段中国大城市的城市空间分布表现为簇状单位大院之间的异质,单位居住区内成员混杂,社会构成表现为异质(Wu and Yeh,1997)。

改革开放给城市社会空间带来新的变化趋向。住房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开始对城市空间发挥巨大影响(Wang and Murie,1996)。以上海为例,城市社会空间的发展体现在大规模的住宅建设,规模化的旧城改造和随之出现的居民搬迁三方面,通过住房消费,空间分异的趋向表现出来:海外、港台人士和城市最高收入者普遍分布在市区中心的新建豪华社区及城市边缘的别墅区内;中高收入者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干线附近的商品房社区;一般中等收入者多分布在早期以单位分配方式获得的公房社区;低收入阶层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旧城区;外来民工这一新的社会群体则于城乡结合部租借廉价私房或搭建棚户聚居,且以籍贯相同的地缘和职业相近的业缘为特征(中国建设报,2003)。居住区之间的异质性加强了,不同社区在物质设施、社区管理服务、社区文化、住房价格和空间布局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同时,居住区内部的均质性则相对增加。

新的社会分层和住房市场的多样化正重塑城市社会空间(Wu,2002)。这也与东欧转型经济国家具有相似性(Sykora,1999)。这表明,尽管存在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的差异,全球化下城市空间的变化是具有共通性的。

3 研究与实证

就方法而言,目前对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多依赖于国家统计和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的研究的确可以很好地揭示空间结构的总体格局,但由于统计和人口普查本身的针对性和局限性,这些数据往往无法充分揭示具体的空间过程,无法将社会空间演化的机制展现出来。我们的研究则采用对城市居民的问卷和个案调查方法,通过对具体城市地域,特别是微观地域的分析来解释城市社会空间整体演化的一般规律。

1991-2000年,上海拆迁了近2600万m²的旧房,安置了600多万居民(上海统计年鉴,2002)。上海城市空间的发展可以说集中体现了当

表1 三个社区的特征

Tab.1 Features of three neighborhoods

指标	新福康里	番茄弄	新泾
土地利用	商品房	工人新村	混和型
建筑特征	多高层	高密度中低层	混和型
人口(人)	3,600	5,000	129,000
用地面积(m ²)	37,886	60,500	11,890,000
建筑面积(m ²)	108,936	69,000	3,104,076
开发时段	2001年	1965年	1980年后
人均住房面积(m ²)	31	13.9	-
绿化率(%)	23.60	-	-
区位	中心区	中心区	郊区
历史地位	解放前的国际租界区,静安第一个大规模整街区更新项目	解放前的贫民窟,1960年代第一个五层工人新村	快速发展的近郊区

注: - 无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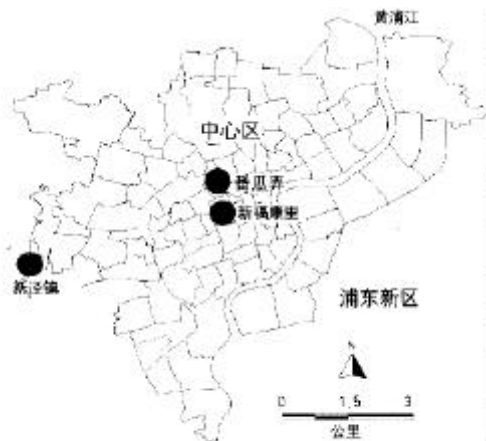


图1 三个社区的区位

Fig.1 Location of three neighborhoods

代中国城市变化的短时、大规模和高效率。有鉴于此,2002年9-10月,我们在上海选择了新福康里、番茄弄和新泾镇三个社区进行问卷调查。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对三个社区的住户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收集了304份问卷,平均每个社区发放了100份问卷。问卷以家庭为调查对象,涉及住户的社会经济条件、住房、生活消费以及社区现状评价等多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与西方一样,社区概念在我国并没有划一的空间界定。一般而言,它可以指代居民委员会,人口规模在300-2000人,上海的居委会规模较大,一般达到3000人左右。上海市政府对社区的界定则是街道层次,其规模要达到5万-15万人。本文我们所指的社区主要是指大城市内部具体既存的住宅区,主体是住宅小区。但考虑到上海市政府对社区的界定,我们也选取了街道层次的社区。

三个社区的基本情况如下(图1、表1)。新泾镇是上海西部长宁区的一个镇,其规模是街道层次,居民总数达到12.9万人,镇区面积11.89km²。该区跨越上海外环线,西接虹桥机场,北濒苏州河。镇区主要由两部分构成,西部(外环线外)是2.8km²的虹康高技术工业园区,东部是主要的居民区、商业区等。我们调查的重点是东部的居住社区。该镇居住空间构成包含有老城区、农民房区、外来民工聚居区、高档别墅区、外国人住区等多重要素,因此这里甚至被称为“新上海”,因为它包含了新上海发展舞台上的所有角色(卢汉龙,2002)。新福康里小区位于静安区的东北部,占地面积3.7万m²,人口3600人。历史上,这一地段属于国际租界区,该社区曾是典型的石库门建筑风格。自1998年启动,历时三年,这里作为静安区第一个“成片整街坊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进行了改造重建,总投资约5亿元,1800

户原居民被拆迁。番茄弄是闸北区历史上有名的贫困居民区,属典型的“下只角”地带。1949年以前,该住区由3800多间被称为“滚地龙”的棚户组成,居住条件恶劣。1965年上海市政府投资500万元将该区建成上海第一个全由5层楼房组成的工人新村。此后除了1990年代“平改坡”和局部绿化的改善,该社区基本保持了当时的格局。

3.1 三个社区的社会空间现状

三个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征如表2、表3所示。三个社区50%左右的户主是50岁以上,新福康里的户主相对其他两个社区来说年龄更大些。这体现了上海当前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趋势。在收入上,新福康里的居民相对其他两个社区富裕一些,番茄弄居民的收入最低。三个社区的年平均收入水平均是1万-3万元。但三个社区居民在受教育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尤其对比新福康里和番茄弄,前者要远超过后者。同样的趋势体现在职业结构上,新福康里的户主多在层次较高的行业工作,而番茄弄户主的职业主要是相对较低级别的职业(图2)。

对于住房而言,我们主要考察了房屋类型、住房来源和住房设备。如图3所示,只有新泾存在简屋类型,这为外来人口在此聚居提供了条件(Fan and Taubmann 2001)。但作为正在逐步扩展的近郊社区,新泾的主体住房是商品房,新福康里也以商品房为主,番茄弄以老工房为多。相对而言,新福康里住区已经全面更新,而番茄弄总体上的住房质量相对落后。就住房来源而言,主要存在五种类型:购买商品、购买经济适用房、购买公房、租用公房和租用私房(图4)。商品房在新泾和新福康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而番茄弄的大量住房属于租用私人业主的住房。就住房

表2 三个社区的人口结构

Tab.2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three neighborhoods

指标	新泾	新福康里	番茄弄	
户主出生年(平均数)	1955年	1947年	1952年	
家庭人口(平均数,人)	3.04	3.28	3.51	
户主婚姻状况(%)	单身	13	7	12
	已婚	80	72	75
	离婚	2	4	2
	寡居	3	12	10
	其他	2	5	1
户主户口类别(%)	上海户口	74	97	66
	其他城市	12	1	9
	农村	14	2	25

表3 三个社区住户的社会经济特征

Tab.3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s of the residents in three neighborhoods

指标	新泾	新福康里	番茄弄	
年收入(%)	不回答	2	17	2
	<1万元	13	4	12
	1万-3万元	48	41	55
	3万-5万元	22	26	28
	5万-10万元	14	10	3
	10万-20万元	1	1	0
	>20万元	0	1	0
受教育水平(%)	未上学	4	3	11
	小学初中	38	25	52
	高中中专	28	31	30
大学或以上	28	41	7	
职业状态(%)	在业	57	35	54
	未工作	43	63	46
	其他	0	2	0
职业类型(%)	干部或经理	26	33	16
	技术人员	19	23	2
	商业人员	10	10	7
	服务业人员	21	15	11
	工人	9	9	15
	其他	15	10	49

注:表中所有指标统计对象均为户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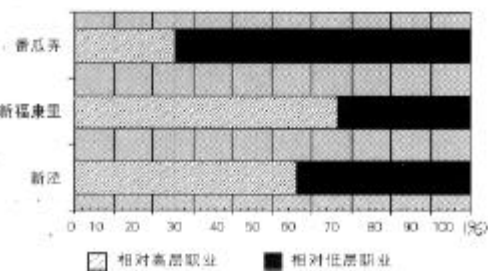


图2 三个社区居民(户主)的职业构成分布

Fig.2 Voc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residents in three neighborhoo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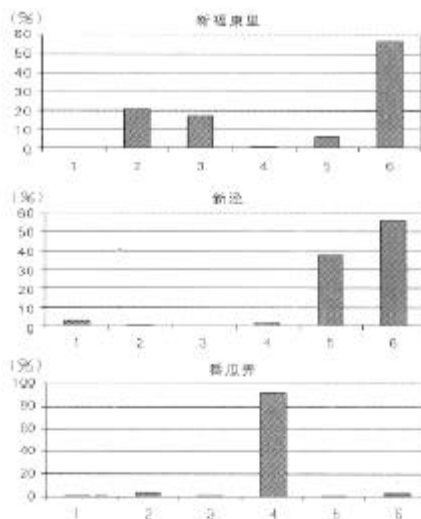


图3 三个社区住房类型

Fig.3 Housing categories of three neighborhoods

1 简屋 2 旧式里弄 3 新式里弄 4 老工房
5 新工房 6 商品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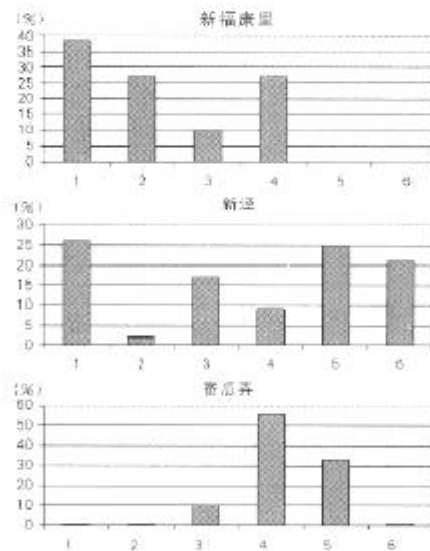


图4 三个社区住房来源

Fig.4 Housing sources of three neighborhoods

1 购买商品房 2 购买经济适用房 3 购买公房
4 租用公房 5 租用私房 6 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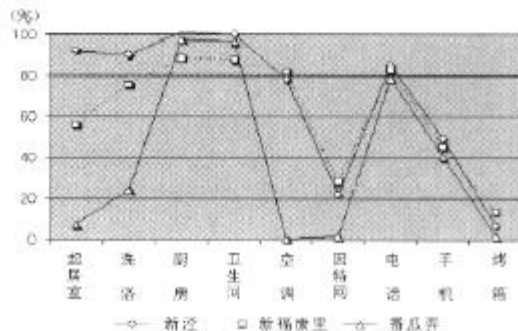


图5 三个社区的住房设施

Fig.5 Housing facilities of three neighborhoods

表4 三个社区新居民与原居民对比
Tab. 4 Comparison between new residents and original ones in three neighborhoods

		新泾		新福康里		番茄弄	
		原居民	新居民	原居民	新居民	原居民	新居民
年收入 (%)	不回答	0	3	12	27	3	14
	<1万元	20	11	6	0	10	62
	1万-3万元	77	40	54	0	51	24
	3万-5万元	8	27	25	15	32	0
	5万-10万元	0	18	3	31	4	0
	10万-20万元	0	1	0	24	0	0
受教育水平 (%)	>20万元	0	0	0	3	0	0
	未上学	12	1	4	0	16	76
	初中	36	40	34	6	40	15
	高中	36	27	34	26	38	9
就业情况 (%)	大学或以上	16	32	28	68	6	0
	失业	16	9	10	6	6	12
	长期工作	44	41	16	67	24	88
职业类型 (%)	临时工	0	21	0	6	7	0
	退休	40	29	74	21	63	0
	干部或经理	55	19	50	26	28	8
	技术人员	9	21	17	26	0	3
	商业人员	0	3	17	7	5	9
户口 (%)	服务业人员	9	23	8	9	0	12
	工人	18	7	8	7	33	3
	其他	9	17	0	15	24	65
	本地	96	61	98	74	97	3
	上海其他地区	0	5	1	17	2	26
	外地城市	0	15	0	3	0	71
外地农村	4	19	0	0	1	0	
	外国人	0	0	0	6	0	0

注：表中所有指标统计对象均是户主。

设施而言,三个社区都具有基本的生活设施,如厨房、厕所等,差异主要表现在辅助生活设施的配备上,如起居室和卫生间,而对这些设施的拥有往往表明了住房的舒适度。从这一点上看,新福康里的住房条件要较新泾和番茄弄舒适(图5)。

3.2 社会空间重构

我们进一步比较原居民与新居民的差异,以考察社区居民群体构成的变化趋势(表4)。新旧居民类型是根据居住长久程度人为划分的,新泾和番茄弄的新旧居民划分以是否于五年前搬入该社区为准,而新福康里的居民则根据是否回迁户进行划分。尽管这样的划分标准值得商榷,但新旧居民的对比无疑是展现社会空间变化的最佳捷径。表4的分析说明新泾和新福康里的新居民均相对原居民具有较高的收入,而番茄弄新居民比原居民的收入低。同时,就教育水平而言,新福康里的新居民具有最高的教育水平,而番茄弄的新居民则使该区整体受教育水平下降,可能的解释是番茄弄新居民多数是外来人口。

我们进一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具有

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居民在不同社区居住的可能性,以此确定对择居影响最大的社会经济因素。首先,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cycle)一般被认为是居住分异主要的影响因子之一(Clark and Onaka, 1983),我们选取了“户主年龄”和“是否有小孩”作为变量。同时,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因子不可缺少,我们选取了“收入”、“工作合同类型”、“工作单位”等因子。住房因子也被用来指代这些影响因子的空间结果,我们使用了“是否商品房”等因子。随后我们主要进行了两组比较:新福康里对比番茄弄,新福康里对比新泾(表5,表6)。

回归分析表明,首先,家庭是否有小孩对两组回归均有明显影响,都对居住在新福康里的可能性有负影响。这是由于番茄弄和新泾有分别高达35%和19%的外来人员,他们一般都正处生育子女的阶段,而在新福康里这样的居民仅占3%的比例。相应的,虚拟变量“退休”对于居住在新福康里的可能性有正态的影响。这和西方城市特别是欧洲的情况基本一致,老年人多会集中居住在中心城区(Knox and Pinch 2000)。值得注意的是,“户主”年龄因子却并不如“退休”因子的影响明显。根据上海市统计局2000年所做的“万户调查”,以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上海市区人口迁居的一般特征为:25岁以下的居民,由于没有结婚,靠近市中心的趋向比较大,不愿到外环线外居住;25-35岁的居民处于结婚生育阶段,多数需购房,开始向外环线外迁移,但多不愿远离外环线;35-50岁,有了积蓄,身体条件允许,更多的开始选择到远郊居住;到50-60岁,身体条件下降,通勤不愿过远,更希望在内外环之间居住;60岁以上的居民多已离开工作岗位,到外环线外择居的趋势又开始增加。

回归分析的结果同时表明,对仍在工作的居民而言,“长期合同”、“工作单位”和“党员”等都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社区重构涉及的人群广泛,因此新居民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面很广;另一方面,1998年以来单位不再分配住房,早期对住区空间有较大影响的组织因素的影响正在减少(Logan, et al., 1999),相对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就表现出突出的影响,明显对于居住在新福康里有正向的影响。这表明,市场功能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正在增强。而且,外来人口身份也表现出一定的重要性,它增加了居住在番茄弄的可能性。就住房而言,大的住房空间对居住在番茄弄的可能性有负面的影响。对比三个社区的平均住房面积,可以直接解释这样的回归分析结论,番茄弄的平均住房面

表5 Logistic 回归系数(1) 居住在社区的相对可能性: 新福康里相对番瓜弄(全体样本)
Tab.5 Logistic regression(1): relative possibility of living in the neighborhood: Xin Fu Kang Li vis-à-vis Fan Gua Nong (all samples)

属性	模型一		模型二(向后剔除法)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户主年龄	-0.015	0.025		
(虚拟变量) 18岁以下小孩	-0.794	0.480*	-0.804	0.468*
(虚拟变量) 户主是长期工作	-0.299	0.803		
(虚拟变量) 户主退休	1.312	0.911	0.911	0.500*
受教育水平	0.685	0.301**	0.572	0.274**
(虚拟变量) 户主在国企类单位工作	0.834	1.057		
(虚拟变量) 户主是党员	-0.531	0.487		
(虚拟变量) 户主是外来移民	-2.986	1.320*	-2.764	1.376**
家庭年收入	-0.443	0.336		
住房面积	0.040	0.011***	0.037	0.010***
(虚拟变量) 商品房	2.417	1.531	1.846	1.292
常量	-2.096	1.659	-3.510	0.904***
对数可能性(-2 log likelihood)		114.174		140.624
卡方(自由度)		136.723(11)	1	10.273(5)
样本数	204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p 指的是显著性水平; 因变量: 新福康里=1;

自变量: 一个或多个小孩=1; 长期工作=1; 退休=1; 单位工作=1; 党员=1; 外来移民=1; 商品房=1。

受教育水平: 文盲半文盲=1; 小学初中=2; 中专高中=3; 大专=4; 大学及以上=5。

年收入(元): 小于1万=1; 1万-3万=2; 3万-5万=3; 5万-10万=4; 10万-20万=5; 20万以上=6。

表6 Logistic 回归系数(2) 居住在社区的相对可能性: 新福康里相对新泾(全体样本)
Tab.6 Logistic regression(2): relative possibility of living in the neighborhood: Xin Fu Kang Li vis-à-vis Xin Jing (all samples)

属性	模型一		模型二(向后剔除法)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户主年龄	0.025	0.022		
(虚拟变量) 18岁以下小孩	-1.024	0.422**	0.936	0.401**
(虚拟变量) 户主是长期工作	0.697	0.642		
(虚拟变量) 户主退休	1.269	0.734	1.284	0.406***
受教育水平	0.225	0.227		
(虚拟变量) 户主在国企类单位工作	0.317	0.627		
(虚拟变量) 户主是党员	0.322	0.424		
(虚拟变量) 户主是外来移民	-3.199	1.129***	-3.509	1.090***
家庭年收入	0.683	0.268**	0.801	0.233***
住房面积	-0.014	0.006**	-0.012	0.005**
(虚拟变量) 商品房	-0.007	0.506		
常量	-3.269	1.423**	-1.251	0.738*
对数可能性(-2 log likelihood)		118.709		193.824
卡方(自由度)		58.492(11)		53.378(5)
样本数	204			

注: 同表5。

积是27.5m², 而新泾的多达70m²。同时, 是否商品房对居住在新福康里和番瓜弄具有影响。

总体上, 我们的实证分析说明新的社会空间变化与社区建设的时段、历史条件紧密相关; 三个社区住房景观和住房质量存在明显的差异, 社区之间居民的经济地位正逐步分化; 社区内同质的趋势明显: 新福康里本身处于升级的态势, 居民表现为提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等; 而番瓜弄外来人口集聚, 社会经济特征处于下降状态中; 新泾由于其空间单元相对较大, 基本表现

为异质性增强的态势。

4 讨论: 同质与混合

上述的实证研究表明了当前我国城市社区重构存在社区的同质化和社区间异质性加强两个趋势。当前社区结构的转变与城市改造更新紧密相关, 城市居民处于城市改造带来的迁居过程之中。原居民、拆迁户、回迁户和购买商品房的居住户构成了社会空间重组的新元素。

就居住在旧的待更新改造居住区的原居民而言,例如番瓜弄的原居民,他们的住房主要建造于1960年代,43%的住户仅为一室户。但是由于其位于城市中心地带,居住密度大,开发成本高昂,因而少有开发商问津。因此在当前城市整体住房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有能力的居民选择搬迁出去,原有居民总量因此减少了近37%。对拆迁户而言,他们一般能够得到住房质量的升级,但中心区商品房高昂的价格往往迫使他们向城市外围迁居。这类居民数量巨大,2001年一年上海总共拆迁的居民达72728户,其中97%的居民被迁离原社区,因而原地段的社会空间特征被彻底改变。而对租房居住的居民而言,他们大都是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在近郊区,或聚居于城市中心租金较低的地段,例如番瓜弄。这样,在新的调配机制下,不同居民依据在住房市场中所处的位置重新集聚分化,构成当代中国大都市新的城市社会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进程的背后是政府的巨大影响。作为宏观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城市开发和建设承担着拉动消费内需的重任,政府不得不推动城市空间的重构。由此,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在历史因素影响下成为市场和政府合力的结果。

为缓解弱势群体同质聚居引发的严重问题,当代西方城市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两类:一方面是在政府强有力的介入下发展房地产业,避免住房极端的商品化,典型的例子是在中低收入人群支付不起的社区建设适量的经济房屋,打破地产商的逐利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有效的规划手段实现混和用地,提升居住群体的异质性,避免弱势群体被过度排斥(Madanipour, et al., 1998)。例如荷兰在1995年开始施行所谓“大城政策”(Big Cities Policies)通过对住房市场的介入改变社区人口构成(Kempen and Primus, 1999; Uitermark, 2003)。1995-1998年,荷兰政府对阿姆斯特丹北部一个衰败的、名为斯塔斯聂登 Staatslieden 的工人聚居区进行改造,其建筑类型主要是多户型的中高层住宅,同时还提供一些平房和经济便宜住房,并在住房设计上尽量鼓励居民的公共交往;在住房配售上,当地居民优先考虑入住,而外来的居民则控制性地入住(Beckhoven, 2003)。这些规划手段在保持社区人口的异质性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

“全球城市”极化说明了社会空间分异与全球化趋势的紧密联系。随着中国的“入世”,中国的城市将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社会分化和空间分异的趋势会明显加强。在住房的福利分配制度取消后,在开发商为主导的社区开发中,如何

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利益,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公平的配置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刘冰、张晋庆, 2002)。在社会空间构成上,微观城市空间发展的同质性虽不可避免,但在一定的城市空间尺度上实现居住人口的异质和基础设施的公平调配则是可行且必须的。事实上,随着城市管理权的下放,城市政府本身也在寻求在新的空间边界内(如街道层次)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城市规划师应在这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感谢UCRN(UrbanChinaResearchNetwork)对作者问卷调查工作的资助。感谢英国ORS奖学金对第一作者的研究资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Beckhoven. Social effects of urban restructuring[J]. Housing Studies, 2003, 18(6): 853-875.
- 2 Belsky, R. The urban ecology of late imperial Beijing reconsidered[J].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000, 27(1): 54-74.
- 3 Bian, Y. and J. R. Log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 739-758.
- 4 Clark, W. A. V. and Onaka, J. L. Life cycle and housing adjustment as explanations of residential mobility[J]. Urban Studies, 1983, 20: 47-57.
- 5 Fainstein, S. S., I. Gordon, et al., eds. Divided cities: New York and Lond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M]. Oxford: Blackwell, 1992.
- 6 Fan, J. and W. Taubmann. Migrant enclaves in Chinese large cities[A]. J. R. Logan. The new Chinese city: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 7 冯建, 周一星. 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1982-2000)[J]. 地理研究, 2003, 22(4): 465-483.
- 8 冯建, 周一星. 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03, 22(3).
- 9 Gu, C. L., J. M. Cai, et al. A study on the patterns of migration in Chinese large and medium citie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9(3): 204-212.
- 10 Gu, C. L. and J. F. Shen.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ocial-spatial structure i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es: the case of Beijing[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3(27): 107-122.
- 11 顾朝林, C. 克斯特洛德. 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J]. 地理学报, 1997, 52(5): 385-393.
- 12 顾朝林, 王法辉. 北京城市社会区分析[J]. 地

- 理学报, 2003, 58(6).
- 13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1.
- 14 Hu, X. H. and D. Kaplan. The emergence of affluence in Beijing: residential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s capital city[J]. Urban Geography, 2001 (22): 54-77.
- 15 Huang, Y. and W. A. V. Clark. Housing tenure choice in transitional urban China: a multi-level analysis[J]. Urban Studies, 2002, 39(1): 7-32.
- 16 Knox, P. and S. Pinch. Urban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M]. London: Prentice Hall, 2000.
- 17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1991.
- 18 刘冰, 张晋庆.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规划对策研究[J]. 城市规划, 2002, 26(12): 82-85.
- 19 Logan, J. R., Y. J. Bian, et al. Housing inequality in the 1990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9, 23(1): 7-25.
- 20 Logan, J. R., ed. The new Chinese city: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 21 Lu, H.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22 Madanipour, A., G. Cars, et al.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an cities: processes, experiences, and responses[Z]. 1998.
- 23 Marcuse, P. The enclave, the citadel, and the ghetto: what has changed in the post-Fordist U.S. city[J]. Urban Affairs Review, 1997, 33(2): 228-264.
- 24 Marcuse, P. and R. Van Kempen, eds. Globalizing cities: a new spatial order?[M]. Oxford: Blackwell, 2000.
- 25 Mollenkopf, J. and M. Castells. Dual city: restructuring New York[Z].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1.
- 26 Nee, V.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 663-681.
- 27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8 Sit, V. F. S. Social areas in Beijing[J]. Geografiska Annaler 81, 1999, B(4): 203-221.
- 29 上海统计年鉴[Z]. 上海: 上海统计出版社, 2002.
- 30 上海房地产年鉴[Z]. 上海: 新华出版社.
- 31 孙施文, 邓永成. 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规划——以上海为例[J]. 城市规划汇刊 2001(6): 16 - 18 接 51.
- 32 Sykora, L. Processes of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post-communist Prague[J]. Housing Studies, 1999, 14(5): 679-701.
- 33 Uitermark, J. Social mix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disadvantaged neighbourhoods: the Dutch policy of urban restructuring revisited[J]. Urban Studies, 2003, 40(3): 531-549.
- 34 Wang, Y. P. and A. Murie. The process of commercialisation of urban housing in China[J]. Urban Studies, 1996, 33(6): 971-989.
- 35 王颖. 上海城市社区实证研究——社区类型、区位结构及变化趋势[J]. 城市规划汇刊 2002(6): 33 - 40.
- 36 Wilson, W. J.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37 Wu, F. and A. G. O. Yeh. Chang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land development in 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 economy: the case of Guangzhou[J]. Urban Studies, 1997, 34: 1851-1879.
- 38 Wu, F.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Shanghai's real estate market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 34: 1591-1615.
- 39 Wu, F. The (post-) socialist entrepreneurial city as a state project: Shanghai's regionalisation in question[J]. Urban Studies, 2003, 40(9): 1673-1698.
- 40 吴启焰. 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M]. 科学出版社 2001.
- 41 许学强, 等.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J]. 地理学报, 1989, 44(4): 386 - 395.
- 42 徐晓军. 论我国城市社区的阶层化趋势[J]. 社会科学, 2000(2).
- 43 Yeh, A. G. O., X. Q. Xu, et al. The social space of Guangzhou city, China[J]. Urban Geography, 1995, 16(7): 595-621.
- 44 易峥, 阎小培, 周春山.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城市规划汇刊, 2003(1): 21 - 24.
- 45 虞蔚. 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与规划[J]. 城市规划, 1986, 10(6): 25 - 28.
- 46 郑静, 等.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再分析[J]. 地理研究, 1995, 14(2): 15 - 26.
- 47 庄林德, 张京祥. 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
- 48 都市郊区住宅的新趋向——北京郊区居住空间分化与居住模式变革[N]. 中国建设报, 2003 - 07 - 28.